

書生膽氣，大將才識—— 論《三國演義》文武關係與治亂隱喻

曾世豪*

摘要

在《三國演義》中，人才鼎盛，經文緯武，如諸葛亮、郭嘉、周瑜、司馬懿等，以文韜而見賞；又關羽、張遼、甘寧、呂布等，因武藝被看重。由於文官有文官身分，武臣有武臣氣概，在書中不同陣營裡，都難免產生頡頏與齟齬之情形，並以性別意識突顯文武辯證的張力。不過，「文」與「武」並非絕對對立：除了文武同心，以求克敵禦侮之外，文官處變不驚，方能充分發揮智謀；武臣臨危不亂，才可有效施展威猛。膽氣與才識是外交及沙場上的兩大羽翼，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三國演義》也據此寫出了文武雙全，融會貫通的理想人物。此外，小說中的文武關係也展現了隱喻的色調，在剛柔並陳的比較與批判之餘，更指向了天下治亂的歧異面貌。太平之中，文人得以發揮經濟之才，而在干戈四起的局勢下，則是武士建業之時機，這使得英雄的資格及面對世變時「積極入世」或「獨善其身」之態度，產生了更複雜的拉扯，值得玩味。

關鍵詞：《三國演義》、文武、丈夫氣、膽識、治亂

2020年4月28日收稿，2020年9月28日修訂完成，2020年10月14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 言

《三國演義》¹ 為中國講史小說之代表，刻劃王綱解紐的漢末亂局，由於權力核心的磁吸效應不再，人才有更高的擇主自由，流動與競爭的態勢驟昇。正如張磊夫（Rafe de Crespigny）所說的：「對多數人來說，存在著忠誠的衝突：是為國家執行公務，還是成為一位控制著政府的軍事領袖的私屬？這一爭論在東漢末期愈發升溫，東漢帝國的弱點之一正是傾向於讓儒生自己選擇支持者——任命他們的人或他們的上級——而不是將自己投入到為整個國家服務的更為抽象的概念之中。」² 此外，伍大福認為，漢末的「士」，無論「文士」或「武士」，擺脫了對權貴（外戚或宦官）的依附，成為地方治理的相對獨立之主導力量，其群體和個體的自覺隨之產生，因此其流動展現了自主意識，³ 這對群雄割據的星散有著推動作用，也使得《三國演義》映射出「古史甚多，而人獨貪看《三國志》者，以古今人才之聚（眾）未有盛於三國者也」的一大奇局。⁴

1 本論文使用版本為明·羅貫中，《三國演義》（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4）。以下為行文方便，所引原文但標回數、頁碼，不另加註。筆者按：此版本即毛宗崗評改本（以下簡稱毛本）。《三國演義》版本問題頗為複雜，從成書的發展來說，史傳、曲藝、說唱等都是小說故事的來源，而今存版本最早為嘉靖本（1522年張尚德或修髯子序），但金文京曾提出論證：即使是嘉靖本，在若干部分用的並非舊本文字（非最古），有些內容也未據史書修正（非最善），因此筆者在文中並不強調《三國演義》的原始面目，而更關注小說的藝術性和影響力。又由於毛評是在題署為李贄、鍾惺、李漁等文士的評注本為基礎去進行集大成的工作，雖然不能否認其中帶有身處時代之觀點（例如對文人的批判，可能與清代貳臣的失節有關），但更多關注的當是歷史文化的共性，好比開篇所謂「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觀察，就涵蓋了歷朝之演化。關於《三國演義》版本問題及毛本的修訂情形，可參考（日）金文京著，邱嶺、吳芳玲譯，李均洋校，《《三國演義》的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頁 175-200；（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北京：三聯書局，2015），頁 361-373。

2 （澳）張磊夫（Rafe de Crespigny）著，方笑天譯，《國之梟雄：曹操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頁 92。上述雖為歷史上的情形，但仍可以作為小說中人才流動的背景與前提。

3 伍大福，〈論《三國演義》與士文化〉，《湖北文理學院學報》37.9(2016.9): 5-6。

4 清·毛宗崗，〈讀三國志法〉，收入陳曦鐘、宋祥瑞、魯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

《三國演義》中的人物薈萃，格外引人注目，毛宗崗在其中特別標舉諸葛亮、關羽、曹操為「三絕」，前兩位分別是賢相及名將的佼佼者，最後一位則著重於其權詐的道德表現（見會評本，正文前頁 5-6），但基本可以看得出來，「三絕」是以「文（賢相）／武（名將）」作為全書的兩大支架，至於「奸雄」在道德與智力的一體兩面，正好與曹操文事／武略相濟的特質互為表裡。⁵

「文」與「武」不管在史實上，⁶ 或者在小說中，皆非截然二分的概念，有時界線微乎其微。除上述曹操的文武兼具外，許多文人出身的重臣都被賦予「將軍」的職銜，如司馬懿本被曹操徵為文學掾，後來曹叡即位後封驃騎大將軍，掌雍、涼兵馬。另外，武將也有文人的風調，如關羽自稱「吾乃解良一武夫」，卻因喜讀《春秋》，被形容為「青史對青燈，則極其儒雅」。

所以「文／武」不能完全從職位去理解，也有文人無謀，武將怯懦，逆轉彼此擅場的情形。進一步來說，「文／武」也可能是品格或風調等個人特質，例如郭嘉曾分析曹袁優劣：「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此武勝也」（第 18 回，頁 164）。從《三國演義》的描寫來看，文武作為隱喻式的說法，與性別意識與治亂情形有一定的互涵作用。過去學界雖有個別針對《三國演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正文前頁 5。筆者按：如前所述，毛評是以諸文士評點為基礎，有很多觀點相合，但其中也有相互齟齬之情形，在若干情節上甚至有所出入，這是因為毛氏旨在恢復古本，對俗本中訛誤、缺失，及唐突昭烈、謾罵武侯（如劉備殺劉封、諸葛亮上方谷燒魏延等）之語，都進行了整飭（見〈凡例〉，會評本，正文前頁 20-21），在藝術水準上有所提昇，在意識型態上則強化了「擁劉反曹」的傾向，因此有對讀的必要。以下為行文方便，所引評點原文，包含毛評、李漁評點（以下簡稱漁評，此版本正文簡稱漁本）、李卓吾評點（以下簡稱贊評，此版本正文簡稱贊本）但標回數、頁碼，不另加註。

- 5 馮文樓，《四大奇書的文本文化學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117。
- 6 歷史上的情形，可見（日）金文京對「吳下阿蒙——武將的學識」之介紹，見氏著，林美琪譯，《三國志的世界——東漢與三國時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頁 174-175。

義》「文」、「武」人物群體提出論介之情形，⁷但並未特別以「文武辯證」的角度提出專門的研究，⁸因此相關問題還有深入挖掘的空間。

本文探討《三國演義》之文武關係，將會以小說內容為主（主要是毛本，其餘版本為輔），並於適當時候則援引歷史上的狀況作為參照。首先擬就「文武」的傾軋出發，除窺探書中文官、武臣的對立或競爭，更進一步要從雌雄的二元圖式窺探小說家所賦予的批判。其次，在文武競爭之外，小說作者及評點者也針對合作情形及個人特質予以稱許，這主要表現在於書生而有膽氣、大將而有才識的價值判斷。最後，文武關係的平衡與否，取決於世道的治亂，書中也有就此予以辯證的情形。在後文的討論中，筆者將借鑑於毛評、漁評、贅評之觀點，作為理解文本的導引，若是評點家未及之處，也會參考學界意見予以補充，以下先談文武的緊張情形。

二、剛柔雌雄：文武競爭與性別意識

金文京曾提到三國時代重文輕武的歷史背景，例如劉巴、魯肅曾以高

-
- 7 專門以文人群體（包含謀士、辯士、隱士等）為主的討論，如吳光正，〈《三國演義》中的文士心態初探〉，《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2(1994.6): 52-57；陳遼，〈《三國演義》中的謀士形象〉，《南通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1.1(1995.3): 1-5；張蕊青，〈《三國演義》中文人形象掃描〉，《江蘇社會科學》1996.1(1996.2): 124-126；陳抱成，〈《三國演義》裡的「說客」與「辯士」〉，《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2.6(1999.11): 111-116；巫夢曉、許中榮，〈《三國演義》中隱士書寫的文化解讀〉，《湖北文理學院學報》40.10(2019.10): 5-10等。以武將群體（包括魏、蜀、吳個別陣營）為主的討論，如王資鑫，〈論《三國演義》的長靠武打藝術〉，《揚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4(1987.12): 19-27；于洪江，〈試論《三國演義》對曹操異姓將領的塑造〉，《佳木斯教育學院學報》1993.1(1993.3): 40-44；劉文菁，「《三國演義》五虎將人物形象研究」（宜蘭：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陳佩姣，「《三國演義》中吳國武將之形塑研究」（桃園：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等。
- 8 有針對《三國演義》將相形象提出見解的，如王前程，〈《三國演義》與古代將相文化〉，《中華文化論壇》2007.1(2007.3): 71-75，但只集中於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身上，未能關照全書。

姿態小覷張飛、呂蒙，後者更是有名的吳下阿蒙的故事，⁹ 然而這些掌故並未出現在小說裡。這或許與《三國演義》戰爭書寫引人入勝，武將地位也拉抬不少有關。書中確實存在著文人鄙夷武將的情況，但比例卻不高。如第 33 回許攸助曹操陷冀州，對許褚誇耀若非自己，曹軍何以入門？許褚非常生氣：「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許攸回罵：「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頁 292）除此以外，儘管《三國演義》常有寫到謀臣揭發敵我將領短處的情形，¹⁰ 但多屬於理性的分析，不算文士輕慢武臣。

小說家筆下，武將貶斥文人或不納謀略的情況比較多。第 14 回陳登勸鎮守徐州的張飛勿喝酒鬧事，張飛說道：「你文官，只管文官事，休來管我！」（頁 125）結果不多久，城池就落入黃雀在後的呂布手中。論到呂布的驍勇善戰，固然無出其右，但同樣難以接受謀士陳宮的忠告而退出問鼎天下的舞臺。類似的例子還包括第 2 回何進嘲笑陳琳反對招集外兵：「此懦夫之見也」（頁 19）；第 25 回袁紹指責田豐：「汝等弄文輕武，使我失大義」以及沮授：「吾之上將，非汝等可料」（頁 226）；第 73 回夏侯存、呂常不顧滿寵避戰關羽的建議：「此書生之言耳」、「據汝等文官之言，只宜堅守，何能退敵」（頁 650-651）等。大部分以武輕文的跋扈將帥，都因不聽忠告，躁進輕動而隕落粉碎。

可見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如果只憑虎賁之勇，不可能無往不利。¹¹ 一如曹操在官渡之戰憑弔袁紹所言，其是以「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的方式戰勝對手「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的戰略（第 33 回，頁 291-292），以「智」

9 （日）金文京著，林美琪譯，《三國志的世界——東漢與三國時代》，頁 174-175。

10 如第 25 回沮授：「顏良性狹，雖驍勇，不可獨任」（頁 226）、第 29 回孫策使者言：「郭嘉曾對曹操言主公不足懼也：輕而無備，性急少謀，乃匹夫之勇耳；他日必死於小人之手」（頁 256）、第 74 回賈詡：「龐德恃血氣之勇，欲與關某決死戰，臣竊慮之」（頁 654）等。

11 例如第 82 回寫彝陵之戰，孫桓仗著麾下李異、謝旌一雙「萬夫不當之勇」的大將，欲請纓擒拿劉備，被毛評批評為「不過恃二勇夫，便不是良策」（會評本，頁 999，漁評大致相同），後來兩人分別被關興、張苞殺敗。

搏「眾」，最後果然逆轉兵少糧缺的頹勢，馮文樓視之為術數的手段。¹²

但是評點家在某些場景中，對文人亦流露貶意，如第 72 回曹彰登場，其人少善騎射，膂力過人，曹操戒之應讀書，曹彰以為大丈夫當效法名將，馳騁沙場，何能作博士？（詳見頁 640）毛評云：「說得博士無用，教楊修、王粲等一班文人何處生活？」（會評本，頁 889）隱約有譏刺之意。這是因為楊修、王粲等人雖有文采，但卻屈節於曹賊，¹³毛評認為「文人無行，文如蔡邕而失身董卓，文如王粲而勸降曹操」（會評本，第 40 回，頁 500）。嚴重一點的指責，如張蕊青貶為「奴顏媚骨，喪失人格」，這樣的文人群體還包括楊松、張松、黃權等。¹⁴

且不論楊松、張松賣主求榮的罪證確鑿，黃權本屬劉璋臣僚，曾反對劉備入川而摔斷門牙，因無力回天，只好歸順劉備，卻又在彝陵之戰四面楚歌的處境下，投降了曹丕，引來了小說家的批判：「堪歎黃權惜一死，紫陽書法不輕饒。」（第 85 回，頁 743）不得不說這樣的評價接近苛責，而另一個文武辯證的例子，更說明了在投曹選擇上的戛戛乎其難哉。第 36 回程昱說破劉備軍師「單福」的來歷：「此人幼好學擊劍；中平末年，嘗為人報讎殺人，披髮塗面而走，……乃更姓名而逃，折節向學，遍訪名師，嘗與司馬徽談論。」（頁 319）。

原來單福本名徐庶，因犯罪而易名，後來被賺到許昌，徐母大罵：「辱子飄蕩江湖數年，吾以為汝學業有進，何其反不如初也！汝既讀書，須知忠孝不能兩全。……今憑一紙偽書，更不詳察，遂棄明投暗，自取惡名，真愚夫也！」（第 37 回，頁 325）毛評云：「元直始不過為俠客，繼則居然作名士，本是後勝於初，乃責其反不如初。妙甚。」（會評本，頁 460）這樣看來，徐庶棄武學文，由「俠客」轉換成「名士」，本來應該是一種品格的提昇，但卻因弗克其終，遭到了嚴厲的指責（真愚夫也），巧妙地

12 馮文樓，《四大奇書的文本文化學闡釋》，頁 53。

13 即便文人有抗曹的意圖，卻表現得不夠果敢，也被譏為「書生氣」。第 20 回董承受衣帶詔密謀誅殺曹操，侍郎王子服提議共立義狀，毛評認為：「開口便要立盟書，頗覺書生氣，是文官身分。」（會評本，頁 250）

14 張蕊青，〈《三國演義》中文人形象掃描〉，頁 125。

呼應了「文人無行」的世俗性意見。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徐庶畢竟乘負了母親辨明忠義的企盼，這應該也映襯了作者對於亂世文人氣節的期許和重視。

當然，為文人「讀書」枉費發出質疑的反諷性意味，莫過於由武將來予以批判。第 29 回因張昭等人乞保于吉，孫策說出這樣的話：「公等皆讀書人，何不達理？昔交州刺史張津，聽信邪教，鼓瑟焚香，常以紅帕裹頭，自稱可助出軍之威，後竟為敵軍所殺。……吾欲殺于吉，正思禁邪覺迷也。」（頁 257）這位擅長「決機於兩陣之間」的「小霸王」反而比挾冊呻吟的文人更加理智，一來一往的對比更增添了貶斥的力度。

文武之間的競爭，尤其集中於投降與否的立場，最著名的場景是赤壁鏖兵之前，東吳朝堂的唇槍舌戰：「時武將或有要戰的，文官都是要降的，議論紛紛不一」（第 42 回，頁 384），讓孫權猶豫不決。由於孫堅、孫策都是親冒矢石打下江山的，因此金文京形容吳國政權具備十足的武人性格，相對於蜀、魏對於豪族、名士的重視，孫權更傾向於考慮魯肅（出身凡品）的意見，而非張昭為首的主降派名士集團。¹⁵ 這雖然是歷史上的情形，但《三國演義》中的描寫基本上差異不大，謀士們只考慮自己的仕途能否延續，¹⁶ 而魯肅雖然在小說中的形象近於文人，但後來官拜都督，且登場之初，周瑜就提到其「平生好擊劍騎射」（第 29 回，頁 261），並非毫無武勇的氣質，也力勸主公應勇於與北軍決戰。

相較之下，張昭、虞翻、步騭、薛綜、陸績、嚴畯、程秉為文士，主張降於曹操，在諸葛亮面前提出許多駁難，但後來流於不著邊際，諸如治何經典、未有實學等，都是與禦敵無關的學問炫耀，最後由黃蓋打斷了「舌戰群儒」的鬧劇。毛評有云：

15（日）金文京著，林美琪譯，《三國志的世界——東漢與三國時代》，頁 77、90、185。

16 聽罷張昭等謀士主降，魯肅勸孫權，眾人皆可降曹操，惟將軍不可降曹操；眾人降尚且累官不失州郡，主公降則不過車一乘、騎一匹，不得南面稱孤。孫權即言：「諸人議論，大失孤望。子敬開說大計，正與吾見相同。此天以子敬賜我也！」（第 43 回，頁 378）

文人之病，患在議論多而成功少。大兵將至，而口中無數之乎者也，詩云子曰，猶刺刺不休，此晉人之言談，宋儒之講學，所以無補於國事也。張昭等一班文士得武人黃蓋叱而止之，大是快事。（會評本，第 43 回，頁 540）

從理性的一面來看，張昭等人對於孫曹利鈍之分析，並非毫無道理，畢竟曹操曾以寡擊眾，戰勝袁紹，更何況赤壁戰前兵力遠勝東吳，戰情充滿了不確定性，但是對毛評來說，主要是站在正統觀的角度，而非著重吳的利益，¹⁷ 所以認同與曹決戰的意見。群儒徒逞口舌之快，猶如「晉人之言談，宋儒之講學」，都只是末節細行的題目來妝點自己的被動、無能、貪生，因此接著在第 44 回周瑜歸來，文武雙方陸續來拉攏，並在諸葛瑾「降者易安，戰者難保」、黃蓋「吾頭可斷，誓不降曹」（頁 388）的意見之中，洩漏出「明明說文官欲保身、武官不惜死」（會評本，頁 554）的歧異，高下立判。由於江東六郡乃是三代經營，大小數百戰而來的碩果，因此黃蓋認為江東文人自保之思慮，乃「可恥可惜」，配合後文周瑜對張昭責以大義的言論，更突顯小說家對「文人無行」的皮裡陽秋。

這種對「文人無行」的挖苦，最高明的手法表現於性別意識之鎔鑄。第 40 回曹軍壓境，傅巽、蒯越、王粲力勸甫繼位的幼主歸降，毛評的批判是「文人不可與謀國事如此」（會評本，頁 505-506），頗合於上文的「文人之病」，都是消極或短於思考應敵之道，輕易地將江山棄如敝屣。小說並且添加一個細節——這時慣常在屏風後竊聽的蔡夫人轉了出來，不愠不火地接受了這樣的提議。毛評說道：「我不怪婦人同此三人之見，卻怪三人不異婦人之見。」（會評本，頁 506，漁評作「卻怪三人同婦人之見」）。

相對於孫吳進取的「武人性格」，劉表治下的荊襄則被指為「文

17 在「擁劉反曹」的正統觀意識下，毛評對東吳的評駁只考慮到是否合於漢室的利益，是將之視為蜀的附庸，貶斥其獨立性，如第 75 回指責其忘歿案之誓而貪圖荊州，與魏合作，淪為漢賊（會評本，頁 917）；又第 96 回提到關於吳為漢之罪人／功臣的分判（會評本，頁 1171）。

弱」，¹⁸ 這個文弱的政權大長期被把持於以蔡夫人為中心的蔡氏家族之手，最後一矢不發地將領土拱手相讓，下此決議的正是文人及夫人。可以參考康正果所謂的「陽剛與陰柔的象徵秩序中」，支配者以「臣妾之道」的期待要求被支配者（無論男性或女性）作出柔弱、卑下和屈從的反應，¹⁹ 如此奴顏婢膝的反應又可稱為「雌伏」。文人持「婦人之見」的「雌伏」，使得武將文聘墮淚，王威遇害，連拔刀一戰的機會都被剝奪，揭糞文人柔弱而武人陽剛的二元對立。而「柔弱／陽剛」又可與性別意掛鉤，²⁰ 在此儘管由服膺「臣妾之道」的文臣占了上風，卻不無貶抑的味道。

此外，如果仔細看小說開篇「青蛇蟠椅」、「蜺墮鷄化」²¹ 被解讀為「婦寺干政」的預兆，則不只中涓橫行導致漢室陵遲的噩運，外戚藉由裙帶關係進入廟堂，卻無經緯之才，也是朝綱敗壞的因素。因此女性對權力的介入，左右了天下大勢：從河北袁家到荊州劉氏，曹操能夠從中取勝，小說家以敗者「總為牝晨致家累」（第 40 回，頁 353）下一註腳，正與第 1 回「雌鷄化雄」的陰影相映。

因「雌鷄化雄」而使得乾綱不振的敗筆很快在第 2 回掀起波瀾。董、何兩宮相鬥，分別以董重、何進為驃騎將軍、大將軍，但二人毫無勇武精神，一個被逼自刎，一個輕易地中宦官埋伏，皆是羊質虎皮之輩。何進的無謀還在於引入外兵，此時因權力的真空，讓董卓得以乘虛而入，在丁原、袁紹之後，已無人敢在朝中反對其廢帝的決議。第 4 回袁紹之叔，也是太傅袁隗亦表示首肯，毛評云：「姪兒頗剛，叔子太軟」（會評本，頁

18 第 7 回「孫堅跨江擊劉表」，被形容是「文弱如劉表，勇壯如孫堅」的對決，但最後劉勝孫敗，毛評認為這是不可料之事。見會評本，頁 73。

19 康正果，《重審風月鑑——性與中國古典文學》（臺北：釀出版，2016），頁 95。

20 廖瓊媛也以「陽剛陰柔」的角度探究《三國演義》，大致「陽剛風雲豪情萬丈」者為武將；「陰柔靈巧婉約旖旎」者是女性、隱士及離情依依的描寫，雖然劃分基礎的不太對等（不完全是身分群體），但大致前者為「武」，後者偏向於「文」。見氏著，《三國演義的美學世界》（臺北：里仁書局，2003），頁 124-135。

21 毛評解釋：「『惟（維）虺惟（維）蛇，女子之樣。』寺人正女子一類也，故有此兆。『以男子而淨身，則雄化為雌矣；以閹人而干政，則雌又化為雄矣。』（會評本，第 1 回，頁 2）

41)，同回之中，名士蔡邕亦被迫屈膝。看似文人節節敗退之際，尚書丁管起身反抗，以象簡擲向董卓；儘管只是羸弱的一擊，卻贏得「滿朝臣宰皆囊括，惟有丁公是丈夫」（頁 30）的褒揚。²²

正是「丈夫」二字，決定了文武之間的剛柔雌雄：一位武將儘管有萬人敵的本領，若在緊要關頭畏葸不前，則失去了武人的格調。第 19 回曹操向困守下邳的呂布招降，呂布主意不定，而陳宮卻用一箭射其麾蓋為答，兩人雖然一武一文，表現出來的氣概卻天翻地覆。漁評云：「呂布柔軟無丈夫氣，陳宮雖失身從人，卻可謂至死不變。」（會評本，232）陳宮抵死不從的姿態，且被譽為「生死無二志，丈夫何壯哉！」（頁 177）「丈夫」本是男子身分，若一個男人表現怯懦，則形同去勢；反之，若一個女人表現出堅毅直爽的氣魄，而非蔦蘿施喬松的臣妾姿態，則被形容為「丈夫」——孫夫人（孫仁）便被譽為「女中丈夫」。²³

雖然《三國演義》是以男性為主體的文本，²⁴ 但女性倩影的偶然點綴，仍具有舉足輕重的敘事意義。毛宗崗〈讀三國志法〉說道：

人但知《三國》之文是敘龍爭虎鬥之事，而不知為鳳、為鸞、為鶯、為燕，篇中有應接不暇者，令人於干戈隊裡見紅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殆以豪士傳與美人傳合為一書矣。（會評本，正文前頁 15）

22 劉玲娜認為其作為非武將人物而壯烈犧牲的精神，可以一直聯繫到第 80 回曹丕篡位時，拒絕交出玉璽的符寶郎祖弼。見氏著，〈尚力與尚義——《三國演義》死亡描寫的聚焦點〉，《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2(2008.4): 23。

23 毛宗崗〈讀三國志法〉云：「孫夫人好甲兵是女中丈夫，司馬懿受巾幗是男中女子。」（會評本，正文前頁 17）不過，儘管孫夫人具有「丈夫氣」，但在第 61 回因為聽信母親病重的謊言而差點急忙帶著阿斗入江東，被毛評批評：「然則由前而觀，不愧為女丈夫；由後而觀，依然女子之見耳」；漁評曰：「看孫夫人前邊許多事，俱是女中丈夫（夫），獨此帶阿斗回一事，到底不離女子見識」。（會評本，頁 751、755），可見「丈夫」與「女子」並非一成不變的氣質。

24 據曲明鑫統計，全書約有 1183 人出場，其中較為具體生動描寫的有 400 多人，但女性只有不到 60 人，僅占 4.5% 左右。見氏著，〈淺談毛宗崗對《三國演義》中女性形象的評批〉，《瓊州學院學報》14.3(2007.6): 68。又李勝提到，整部作品大約為 73 萬字，但寫到女性的字數還不到 9 萬。見氏著，《四大奇書中的女性形象探析》（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頁 73。

以「龍爭虎鬥」、「干戈旌旗」與「鳳鸞鶯燕」、「紅裙粉黛」為對照，是一種對偶及補襯的關係，彼此有相互滲透甚至顛覆的可能。²⁵ 曲明鑫認為，小說中被讚揚的女性，如貂蟬、徐母、孫夫人、辛憲英、夏侯令女、馬邈之妻李氏、劉諶之妻崔氏等，基本上是以男性化為楷模（巾幗不讓鬚眉），²⁶ 而這種「男性化為楷模」的肯定，很大程度來自於「武」的精神烘襯；²⁷ 孫夫人的「武」，正與「剛」的特質互為表裡。²⁸ 反過來說，當讀者赫然發現「武侯之學，夫人多所贊助焉」（第 117 回，頁 1034-1035）時，秉承髮妻（黃氏）韜略的諸葛亮，對「仲達既為大將，統領中原之眾，不思被堅執銳，以決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謹閉刀箭，與婦人又何異哉」（第 103 回，頁 918）的譏刺，就更添幾分文武職位與性別意識的纏繞、曲折。

藉由女子壓倒男子的性別辯證，不止於孫仁／黃氏／司馬懿之組合，也表現在讀者熟悉的貂蟬身上。雖然在前文提到評點家對於「文人無行」的責難，但吳光正提醒，書中文士們不僅有著強烈的個人功利價值追求，而且還有著社會功利價值的追求，希望能削除荼毒國家和百姓的奸黨逆賊。²⁹ 就在第 4 回唐妃自願替廢帝飲下鴆酒、越騎校尉伍孚行刺失敗後，激起了王允報國之心，間接推動了曹操矯詔及後續討董聯盟的形成，但很快證明了這些跋扈將軍的忠義只是「軍合力不齊」的戲碼。匡扶漢室的重擔還是落到了王司徒的肩上，第 8 回在其計畫下，貂蟬被送到了董卓與呂布的面前。

以貂蟬為誘餌的美人計看似只是西施故事的重演，但評點家卻用了大

25 關於中國文學中的對偶美學及其與小說「二元補襯」（complementary bipolarity）之關係，可參考（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著，《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頁 58-67、120-123。

26 曲明鑫，〈淺談毛宗崗對《三國演義》中女性形象的評批〉，頁 69。

27 李勝曾注意到這一點，見氏著，《四大奇書中的女性形象探析》，頁 79。

28 周瑜首先提到：「主公有一妹，極其剛勇，侍婢數百，居常帶刀，房中軍器擺列遍滿，雖男子不及。」（第 54 回，頁 471）此外，程普也說：「郡主自幼好觀武事，嚴毅剛正，諸將皆懼。」（第 55 回，頁 481）

29 吳光正，〈《三國演義》中的文士心態初探〉，頁 52。

量辭彙將其婀娜的身段比喻為「女將軍」的「兵器」，³⁰ 其中固然有「紅顏禍水」的傳統觀念作祟，³¹ 從文武辯證的角度來看，這種「至柔」與「至剛」的逆轉卻有更值得注意之處。³² 首先，在《三國演義》其他地方也有把女性比為「將軍」的情形，³³ 「她」們不一定風情萬種，品格高潔，但卻是計策得以施行的載體，並造成武將生命的威脅。其次，女性敢於赴死的精神，也被比為武將。第 64 回，姜敘之母楊氏與趙昂之妻王氏為堅定子、夫——這兩人都是武職——與馬超一戰的意念，寧可以自殺激之，雙雙被毛評稱許「(又)一個女中丈夫，可比斷頭將軍」(在前一回，宣誓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的嚴顏自毀壯語)。

由此可見，這些女性以柔克剛及果敢無畏的姿態受到評點家的注意，因此濃縮為對書中巍峨戰士們的尖銳反諷：「十八路諸侯不能殺董卓，而一貂蟬足以殺之；劉關張三人不能勝呂布，而貂蟬一女子能勝之」(會評本，第 8 回，頁 84)，除了前者指向聯盟軍的裹足不前，後者則巧妙呼應了浦安迪 (Andrew H. Plaks) 對於關羽無敵形象的損害的觀察。³⁴ 在這層意義上，即使作為名將代表的關羽，也有值得檢討之處：正是其剛強的性

30 如毛評云：「以衽席為戰場，以脂粉為甲冑，以眸睇為戈矛，以顰笑為弓矢，以甘言卑詞為運奇設伏，女將軍真可畏哉！當為之語曰：司徒妙計高天下，只用美人不用兵」、贊評云：「一書生謔曰：玄德、雲長、翼德三人並戰呂布尚且費力，貂蟬以一油粉女子一戰勝布，真大將軍也」；漁評云：「雙股劍、青龍刀、丈八矛俱不敵女將軍裙下兵器」(以上見會評本，第 8 回，頁 84、93；第 9 回，頁 97)。

31 如曲明鑫即以此觀點詮釋，見氏著，〈淺談毛宗崗對《三國演義》中女性形象的評批〉，頁 69。

32 贊評提醒讀者，董、呂的失腳是：「至剛伏於至柔也」(會評本，第 8 回，頁 93)。

33 例如郭汜之妻、孫翊之妻徐氏。第 13 回太尉楊彪以郭汜之妻善妒，欲在其身上行反間計，毛評云：「又是女將軍出頭」(會評本，頁 147)，這便與其容貌無關；第 38 回徐氏以自己的美貌為餌，設計誅殺反叛丈夫的嬌覽、戴員，毛評云：「比及孫權兵到，女將早已殺賊矣」(會評本，頁 482)，其才節雙全的表現，被認為是孫夫人之外的「東吳女丈夫」。

34 (美) 浦安迪認為「在第 5 回關羽溫酒斬華雄的著名情節之後不久，他的無敵戰將形象就因與呂布對陣不力而受到損害(那場戰鬥有他兩位「兄弟」戮力同心相助也無濟於事)」。見(美) 浦安迪，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頁 399。

格過於突出，³⁵ 以至於被諸葛亮不無責備意味的以「關公平日剛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禍」（第 78 回，頁 685），來向劉備寬慰其大意失荊州的敗亡，³⁶ 這恰恰與劉備自己對黃祖之死的輕描淡寫如出一轍。³⁷

職是，小說家之寫「女中丈夫」，首先乃是對於書中「文人無行」之雌伏的對比；再者女將軍的「至柔」折服「至剛」，則是從另一個角度批判武將們的木強則折。「剛」作為武勇的質性，可以撐起文臣的風骨，³⁸ 但對於鎮守城池的將帥來說卻不宜過度膨脹，否則只會導致盲目與貶損，這不禁使人思考，「文／武」理想的平衡應該是怎麼樣的狀態？這個問題的解答，可能就在於「剛／柔」之間的調和與拿捏，以下針對小說中理想文武關係論述之。

三、膽識兼優：理想之文武關係

《三國演義》中，文武競爭的場面很多，即便關羽、諸葛亮各自代表了「名將／賢相」的典範高度，但其實兩人之間的緊張從未真正消除。早在劉備三顧茅廬時，關羽便流露出「不悅」之感，認為此人只是故弄玄虛——這種情緒更常由直白的張飛口無遮攔地表現出來；而諸葛亮為了駕馭陣中將官，也常常以激將、競賽和軍令狀等賭注的方式來達到目

35 夏志清認為，關羽的優點與弱點都來自於他的「剛愎自用」，並且其悲劇在於把自己威風凜凜的外表當成內在的真相。見氏著，何欣、莊信正、林耀福譯，劉紹銘校訂，《中國古典小說》（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6），頁 85-87。

36（美）浦安迪提到，「剛而自矜」是《三國志》〈關羽傳〉最後對關羽做出的評語，小說作者把這評語移至第 78 回借諸葛亮之口說出，鑑於這兩位自命不凡者齟齬中的特殊緊張關係，這一史學家對於關羽的論贊就不是一般的嘲諷之詞了。見氏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頁 398-399、427。

37 劉備勸劉表勿起兵報復，其云：「黃祖性暴，不能用人，故致此禍。」（第 39 回，頁 345）。

38 如從事王累、尚書崔琰、尚書王經，分別因反對劉備入川、反對曹操稱王、拒絕投效司馬昭而死，這些不同意識形態的忠心文士，都被譽為「剛」，見第 60 回，頁 532、第 68 回，頁 607、第 114 回，頁 1010。

的。³⁹ 另一方面，從大的戰略來看，諸葛亮曾反過來對關羽鎮守荊州一事感到「不悅」，認為其雖有死義之心，卻不知放下身段，最後果然違背了自己「東和孫權」的忠告，打亂了三分天下的計畫。⁴⁰ 更不用說關羽死後，與其臉譜相似的魏延（面如重棗），是如何桀驁不馴，⁴¹ 最後與長史楊儀的公開決裂，更象徵了蜀漢內部文武勃谿的沸點。

儘管如此，文與武畢竟是一對羽翼般的存在，必須相互配合，方可維持一方江山的屹立不搖。職是，雖然上述蜀漢文武不協調的情形格外刺眼，但在這個「天時」、「地利」不如魏、吳的集團之中，也只有仰賴「人和」的同舟共濟，才能獲得逐鹿中原的入場券。以第 35 回司馬徽「關、張、趙雲，皆萬人敵，惜無善用之人」（頁 311）的洞見為基礎，有論者將文武之間的關係比喻為頭腦與四肢、⁴² 紅花與綠葉的關係。⁴³ 事實上，水鏡先生的觀點是一體兩面的：不只五虎大將在臥龍、鳳雛指揮下，才得以充份展現武功將略；反過來說，即便神機妙算如諸葛亮，面臨沒有好食材的狀況（關張無命欲何如），亦難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由此可知，文武一心對統御者來說何其可貴，化約為劉備所說的，就是「智賴孔明，勇須二弟」（第 39 回，頁 347）。

這種「善用之人」的重要性，當然也表現在其他陣營。例如曹操在討伐董卓時，所能調用的只有樂進、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等親信，且清一色的武將，很快地遭遇滎陽大敗。如葉松林分析的，曹操直到荀彧、郭嘉、程昱等智囊加入，才擘畫出由山東進京、奉天子以從眾望；先取呂布，然後圖紹；下江南的完整奮鬥目標。⁴⁴ 除了提供遠程戰略

39 詳見（美）浦安迪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頁 399-404、426-428。

40 見夏志清著，何欣、莊信正、林耀福譯，劉紹銘校訂，《中國古典小說》，頁 89-90。

41 在贛本及漁本中，都有諸葛亮想趁魏延引司馬懿入上方谷後，一箭雙鵰地將兩人燒死的情節，贛評對這件事的觀點是「孔明如此謀殺魏延，彼何肯服？何不明正其罪，乃為詭計乎？此正道之所無也。」版本異文及評語，見會評本，第 103 回，頁 1269-1270。

42 王前程，〈《三國演義》與古代將相文化〉，頁 72。

43 張蕊青，〈《三國演義》中文人形象掃描〉，頁 125。

44 葉松林，〈謀士與皇權——《三國演義》中謀士形象評析〉，《荊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2(1998.6): 37-38。

外，在沙場上，曹營也表現出文武的巧妙配合，如第 31 回程昱獻「十面埋伏之計」，分撥武將為十隊，殺得袁軍血流漂杵。曹操在拜讀陳琳的檄文後也說過：「有文事者，必須以武略濟之。陳琳文事雖佳，其如袁紹武略之不足何！」（第 22 回，頁 200）。

作為一國領袖，使臣僚齊心戮力的資質十分重要，書中的孫權就嫻熟此道。第 29 回孫策臨亡之際對弟說道：「若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使各盡力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頁 259）又將國政分為內外：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這段情節，可為武功文治的不同側重下一註腳。在孫權領導下，即使曾遇到赤壁戰前的嚴重爭辯，但終究文武團結一致，以黃蓋、闕澤合力演出的詐降戲碼為代表，東吳的整體表現是：「勇將輕身思報主，謀臣為國有同心」（第 46 回，頁 412）。

相較之下，孫權頗短於躬蹈矢石的戰鬥。第 53 回「孫仲謀大戰張文遠」，孫權與張遼親自對壘，卻不敵對方的威勢，不僅吳兵大敗，且折損一員將領，長史張紘有云：「主公恃盛壯之氣，輕視大敵，三軍之眾，莫不寒心。即使斬將奪旗，威振疆場，亦偏將之任，非主公所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王霸之計。」（頁 466）孫策、孫權兄弟的例子，說明了「文／武」在稟賦上確有其隔閡，尤其要投筆從戎，有體魄上的限制。像孫權之擅場在於治國，固然不宜效顰學步，但倘能才兼文武，自然是上駟之選。

所謂「才兼文武」，在小說中更多時候指的是文人有武將風範，或者武將有文人謀略，兩者之間達到相濟互補的理想。⁴⁵ 小說中不只一次提

45 筆者在此談論的「理想之文武關係」，重點非單純指文武兼備之人。首先，前文已提到，三國人物的「文武」不能單純用職官來判斷，如曹操、司馬懿、諸葛亮都是文人出身而任武職，因此文武的論斷更在於稟賦、氣質。其次，評點中由於受到正統意識的影響，較常從道德的角度出發，而非客觀的立場去評判這些人物的文武兼備，多數時刻甚至略而不提（例如曹操「橫槊賦詩」的著名場景，毛評只說其「驕盈」），因此要將所謂「文武兼備」之角色集中化來進行析論，可能會令人大失所望。反之，在若干評點中，則有些關鍵字（剛柔、膽氣、才識等）值得注意，且會在傳統上認為文士、武臣職位之人身上看到巧妙的辯證。

到，為將者必須取得剛柔之平衡，如第 71 回曹操送給夏侯淵的書信提到：「凡為將者，當以剛柔相濟，不可徒恃其勇。若但任勇，則是一夫之敵耳」（頁 629）；第 100 回諸葛亮寫給曹真的書信則說：「竊謂夫為將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剛；能進能退，能弱能強」（頁 889）。關羽的失敗，癥結亦在於此，第 76 回毛評云：「關公之不得復荊州也，以呂蒙能撫城中之民。……關公用陽，而呂蒙用陰；關公用剛，而呂蒙用柔。」（會評本，頁 928）正是其不夠警覺、圓融，才讓呂蒙找到用計的施力點；而「剛柔相濟」、「能柔能剛」，也暗示了兼達文武的道理。

雖然上文提到，「文／武」之間有一定的隔閡，但這主要在於身體素質；事實上「文／武」也有貫通之處，特別是謀略的施展，畢竟領軍作戰，不能單憑血氣之勇，要引文濟武，而具體的步驟便是「攻讀兵法」。

同樣是第 100 回，魏蜀兩軍鬥陣法，諸葛亮抓得張虎、戴陵、樂綝，說道：「吾放汝等回見司馬懿，教他再讀兵書，重觀戰策，那時來決雌雄，未為遲也。」（頁 890-891）毛評云：「叫他回去讀書，竟似對求試不中的秀才說。」（會評本，頁 1227）看似戲謔的一段話，暗示了文道與武道並非壁壘分明，二者都可透過鑽研及訓練獲得進步。第 58 回贊評對於曹操愈挫愈勇的精神，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見解：「老瞞每到敗後愈有精神，真奸雄也。倘秀才考得劣等亦能如此，安有不為大魁之理？可憐今世無膽力者，一遇逆風，遂停舟痛苦矣。」（會評本，頁 723）。

贊評對於秀才掄元的聯想，固然與小說本身關係不大，但卻指示了文人遭逢挑戰時，應該要有「膽力」的道理，這恰與評點者對《三國演義》理想文武人物的看法相呼應。身為武將，「膽氣」是必備的條件，武將不惜命，如第 41 回「趙子龍單騎救主」、第 68 回「甘寧百騎劫魏營」、第 110 回「文鴛單騎退雄兵」等，這些人物都被譽為有膽，⁴⁶ 在沙場上展現衝鋒陷陣的勇猛，令人印象深刻。不過，「膽氣」並非武臣的專利，對文士、

46 對於趙雲膽氣的稱許，主要見於第 71 回，劉備稱：「子龍一身都是膽也！」（頁 634）。第 68 回孫權解釋何以答應甘寧只撥一百人馬劫營：「非孤相捨，正欲觀卿膽耳。」（頁 604）。文鴛驍勇的形象被比為趙雲，並有詩贊：「樂嘉城內爭鋒處，又見文鴛膽氣高。」（第 110 回，頁 980）。

謀臣來說也不可或缺。第 47 回黃蓋欲用苦肉計誘騙曹操，需一人送書，關澤被認為是適切的人選：

卻說關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好學，與人傭工，嘗借人書來看。看過一遍，便不遺忘；口才辨給，少有膽氣。孫權召為參謀，與黃蓋最相善。蓋知其能言有膽，故欲使獻詐降書。澤欣然應諾曰：「大丈夫處世，不能立功建業，不幾與草木同腐乎！公既捐軀報主，澤又何惜微生！」（頁 413）

關澤「好學」，過目不忘，口若懸河，這些無疑屬於文人的特質，但小說家也同時強調其「膽氣」、「有膽」，並從其慷慨陳詞略窺一二。毛評云：「其言大有膽氣，可見無膽氣者必不是能讀書人。」（會評本，頁 589）其認為，真正讀書人反而應具備「膽氣」。讀書有膽氣之說，頗承襲自孟子善養浩然之氣的悠久觀念，這種正氣「至大至剛」，能讓人維持穩定的心緒。第 57 回周瑜氣死，毛評云：「周瑜少年，經怒不起，蓋其讀書養氣之學不及孔明耳。」（會評本，頁 702）雖然「怒氣」與「膽氣」都是武勇的表現，不過前者卻流於浮躁，所以讀書養氣，正是要培養剛而不暴的氣度，以臨危不亂的冷靜判斷來面對爾虞我詐的戰場。

文人「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沉著，甚至能形成武士的榜樣。第 66 回「關雲長單刀赴會」，關羽之所以無懼東吳擺下的鴻門宴，在於：「昔戰國時趙人藺相如，無縛雞之力，於澠池會上，覲秦國君臣如無物；況吾曾學萬人敵者乎！」（頁 585）這段話說明了「膽氣」無關乎一個人的氣力大小，而在於其內心的強度。當然膽氣也不是有勇無謀：關羽仔細安排好救應部隊以防自己發生意外，儘管這件事被浦安迪視為其英勇形象的缺損，⁴⁷ 但卻不失為智與勇的相輔相成。

亂世之中，文人表現膽氣的舞臺首先可見於外交的場合，前文提到的關澤正是偽裝成黃蓋的密使來到曹營。其餘如張松、李恢、趙咨、鄧芝等，都被論者注意到其「膽識」；⁴⁸ 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使臣或說客往往面

47 （美）浦安迪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頁 399。

48 如陳抱成，〈《三國演義》裡的「說客」與「辯士」〉，頁 114；羅曉芳、雷勇，〈《三國

臨武嚇式的壓迫，可見陳抱成的概括：

西蜀別駕張松，在曹操五萬「虎衛雄兵」的刀山劍樹面前，他是「斜目視之」，「全無懼意」。李恢說馬超時，馬超「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囑曰：『令汝砍，即砍為肉醬！』」李恢卻「昂然而入」，一進帳就理直氣壯地挑明「特來作說客」，硬是「說」得馬超「大慚」，心悅誠服地歸順了劉備。又如鄧芝使吳，「行至宮門，只見兩行武士威風凜凜，各持鋼刀、大斧、長戟、短劍，直列至殿上。芝曉其意，並無懼色，昂然而行。至殿前，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芝但微微而笑。」⁴⁹

此外，第 82 回趙咨也面臨了曹丕「伐吳」的威脅，咨以「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策」、「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畏之有」（頁 719），表現出不卑不亢的格調，也可以看出使臣「不辱君命」的前提，在於後方國防的支撐。趙咨不失東吳氣象的得體表現，也感染了本來文弱的同僚。同一回中，曹丕命刑貞冊封孫權為吳王，刑貞顧盼自雄，張昭斥其無禮：「豈以江南無方寸之刃耶？」（頁 719）以「方寸之刃」壯大自己聲勢，無形中也是反過來引武濟文。毛評認為「子布此時頗有膽氣。」（會評本，頁 998）。

漁評云：「張松所持者文，曹操所耀者武」（會評本，第 60 回，頁 740），顯示「折衝樽俎」中潛藏的戰爭陰影，使節所走每一步都是如履薄冰。也有人因此被嚇破了膽，像蔣幹在「群英會」就被佩劍監酒的太史慈唬得不敢多言。在小說中，大多數文人可以從刀光劍影下全身而退，以文勝武，例如毛評云：「李恢舌劍，可以退帳下之劍。」（會評本，第 65 回，頁 806）即使不幸遇害，也留下壯烈的身影，永垂不朽。第 23 回「禰正平裸衣罵曹」，禰衡雖有文采，卻心高氣傲，出言不遜，最後輾轉死於粗魯的黃祖刀下。雖然表面上是文人為武夫所戮的挫敗，但毛評云：

演義》中的說客及其游說藝術》，《陝西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5.2(2017.5): 52-53。

49 見陳抱成，〈《三國演義》裡的「說客」與「辯士」〉，頁 114。

操自負奸雄，其才力足以推倒一世，而禰衡鄙夷傲睨，視若無物，非膽勇過人，安能如此？生前既罵曹操，死後又罵王敦，至今鸚鵡洲英靈不泯，豈得僅以文人才士目之耶！（會評本，頁 280）

禰衡的「膽勇」，使之痛罵奸雄的精神不泯，甚至擢昇到超越文人才士的境界，尤其洗刷前文提到「文人無行」的軟弱形象，這就使得其文弱的形象受到顛覆，達到英靈不泯的境地。第 40 回同時發生了孔融抵牾曹操遇害（被脂習形容為「剛直太過」），以及王粲等人力主降曹的情節。毛評認為孔融、禰衡「兩人之志節，實足動義概而忤雄風，然則無行文人之說，其賴此二人而一雪斯言歟」（會評本，頁 500-501）。可見文人以「膽勇」而「剛直」，是漸次沾染武士風範的，甚而壓倒「雄風」的恫嚇。

文人的「膽氣」除了外交外，也可見於沙場上。有論者將戰爭中的決策分為無風險獲小利（趨利的保守型）及有風險獲大利（冒險進取型）的兩種類型，通常常人會選擇前者，例如袁紹；而與眾不同的，如奸雄曹操，常在後者獲益——巧妙的是，第 92 回諸葛亮與魏延對子午谷之謀的歧見，正代表了兩者不同決策心理。⁵⁰ 儘管諸葛亮視魏延的建議為險棋，不肯採納，看似代表了文人的謹慎（甚至膽小鬼之譏⁵¹），但是在第 95 回其卻大擺空城計，毛評言：

唯小心人不做大膽事，亦唯小心人能做大膽事。魏延欲出子午谷，而孔明以為危計，是小心者，唯孔明也；坐守空城，只以二十軍士掃門，而退司馬懿十五萬之眾，是大膽者，亦唯孔明也。孔明若非小心於平日，必不敢大膽於一時。仲達不疑其大膽於一時，正為信其小心於平日耳。（會評本，頁 1158）

在正常情況下，諸葛亮不會鋌而走險，但十萬火急之際，其反應也不是跟其他留在身邊的文官一樣驚慌失措，而是鶴氅綸巾、焚香操琴，用優雅的姿態應對魏軍壓境，關鍵正在於「小心人能做大膽事」，不僅化險為夷，

50 魯德才、陳洪，〈《三國演義》中的軍事心理學〉，《海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3（1988.9）：17-18。

51 據說魏延曾如此痛罵。見（日）金文京著，林美琪譯，《三國志的世界——東漢與三國時代》，頁 141。

也成為小說中家喻戶曉的一幕。另外第 74 回的滿寵，在樊城曹軍受水攻而驚慌「喪膽」的同時，冷靜地指出大水旬日自退，力勸曹仁勿棄城而去，就是幕僚型人物沒有被嚇破膽的例證，如此方能做出正確的判斷，穩定軍心，化險為夷，在戰場上的重要性不遜於武人的衝鋒陷陣。這種智慧與膽氣的搭配，正是扭轉乾坤的關鍵，甚至反過來激勵了諸將死守的決心。

文人的膽氣也表現在戰敗後的操守。第 84 回陸遜大破劉備，蜀祭酒程畿不願逃走，在被吳軍包圍的狀態下，拔劍自刎。毛評云：「文臣亦有武將之風，惟書生能忍辱，亦惟書生不肯受辱。」（會評本，頁 1026）程畿的「不肯受辱」，對應的是陸遜的「能忍辱」；書生的膽氣並非浮躁輕動（如前文提到的周瑜），所以表現出來乍看之下「儒」，其實是「能忍辱負重」，⁵² 亦即胸有成竹，不被敵軍的騷動干擾判斷，最後果然大破蜀軍。毛評云：

書生而有大將之才，不得以書生目之。亦惟書生而有大將之才，則正以其書生而取之。先軫悅禮樂而敦詩書，晉之名將，一書生也；張巡讀書過目不忘，唐之名將，一書生也；岳飛歌雅投壺，孟珙掃地焚香，宋之名將，一書生也。每怪今人以書生相詬詈，見其人之文而無用者，輒笑之為書生氣。試觀陸遜之為書生，奈何輕量書生哉？（會評本，第 83 回，頁 1004）

這段話對於理解《三國演義》文武之辨有很重要的指示性意義：大將不一定是被堅執銳，即使文弱似儒的書生，只要冷靜沉著，處變不驚，就能在戰場上有好表現——陸遜在〈讀三國志法〉便被拿來與周瑜、司馬懿並列為「行軍用兵」的代表（會評本，正文前頁 6）。除了陸遜外，呂蒙、羊祜、姜維也被浦安迪視為絲毫未帶反諷貶損的小說人物，⁵³ 儘管知名度不如曹操、司馬懿、諸葛亮、周瑜等一般認為是文武兼備的人物，但這些

52 第 83 回寫「陸遜傳下號令，教諸將各處關防，牢守隘口，不許輕敵。眾皆笑其儒，不肯堅守。」韓當並且當面提出「吾非貪生怕死之人，奈何使吾等墮其銳氣」的質疑，諸將響應，陸遜厲聲回答：「僕雖一介書生，今蒙主下託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負重故也。」以上見頁 731-732。

53 （美）浦安迪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頁 458。

角色無疑都是「書生」與「大將」形象的融合，受到評點家的讚揚，⁵⁴ 能讀書，且不只是紙上談兵（像是馬謖），更應該以書生而可取。陸遜既是書中儒將的代表，並由「大有膽氣」的讀書人闕澤來舉薦，更突顯出書生識書生的慧眼。

書生讀書養氣，剛柔相濟，有膽有謀，則可以為大將，那反過來說，大將又是什麼樣的資質呢？第 53 回張遼指揮若定，不因太史慈策動的內亂而失方寸，成功守住合淝，毛評有云：

張遼之守合淝，其真大將之才乎？赤壁之戰，射黃蓋以救曹操，猶不過戰將之能耳。觀於此卷，有大將之才三：既勝而能懼，是其慎也；聞變而不亂，是其定也；乘機以誘敵，是其謀也。宜其為關公之器重歟！惟大將不懼大將，亦惟大將能知大將。（會評本，頁 654）

作為「大將」，要能慎重、穩定、謀慮，並非只有馬上廝殺；這已不只是武人給人的印象，而更向文士靠攏，是智與勇的複合體。與張遼齊名的甘寧，⁵⁵ 也是頗通書史，有氣力（第 38 回，頁 341），在諸葛亮隆中對之後，亦向孫權獻策取南荊、圖巴蜀，非徒匹夫之勇。像第 111 回鄧艾料定姜維雖退必出，漁評譽為「將略之才」（會評本，頁 1350）；113 回姜維冷靜應對內應外合之兵，讓毛評聯想到「與張遼之守合淝彷彿相似」（會評本，頁 1375），此二人在〈讀三國志法〉更被視為「智勇悉敵」（會評本，正文前頁 6）。

如果看毛評對於「戰將」與「大將」的分判（這也是前文張遼身上出現的辯證），更能看出「大將」所需之條件。其以為：「五虎將中，關、張、趙、黃皆大將才也。若馬超，則可為戰將，而不可為大將。其殺韋康，屠

54 呂蒙一開始只是武將，但後逐漸能謀。第 61 回毛評云：「能守而後能戰，有備而後無患。呂蒙可為善計」（會評本，頁 758）。羊祜輕裘寬帶，被毛評譽為「居然文士風流」、「彬彬然有儒雅之風，其視羽扇綸巾亦不多讓」（會評本，第 120 回，頁 1443、1446）。姜維則是「兵書武藝，無所不通」、「文武雙全，智勇足備」，贊評云：「一姜伯約也，子龍愛其武藝，孔明愛其謀略，惟恐失之，必期得之而後已。」（會評本，第 93 回，頁 1144）。

55 第 68 回孫權云：「孟德有張遼，孤有甘興霸，足以相敵也。」（會評本，頁 604）。

百姓，不得謂之仁矣；其不疑楊阜，不得謂之智矣。」（會評本，第 64 回，頁 787）馬超因濫殺無辜、判斷力不足，而被認為不適任大將，最多是戰將，可知戰將只要求攬戾執猛，大將則需更多懷柔、機警的本領。

相較之下，五虎大將中其餘人物，以趙雲來說，第 81 回其諫劉備以漢賊之仇為重，勿輕易以關羽之仇伐吳，毛評云：「子龍見識有大臣、諫臣之風，不當以戰將目之。」（會評本，頁 984）以「大臣／諫臣」之資質來區隔「戰將」，關鍵在於「見識」，亦即優異的洞察力、能以大局為重，這正需要經驗與智慧，已不單純是武藝方面的才幹，更接近於謀士的判斷——夏志清便曾指出，趙雲勇敢、冷靜、穩重，又是個戰術家，是諸葛亮心目中的第一大將。⁵⁶

趙雲不只有戰略的眼光，而且通曉審時度勢之道，第 65 回勸諫劉備不要益州民田當作封賞，被毛評譽為「有古大臣之風焉！豈獨一名將之才，足以盡之！」（會評本，頁 799）這位一般認為是虎將的人物，其實已接近小說家心目中愛民愛國的「賢臣」。所以文武在小說中確非二元對立的關係，賢相如諸葛亮可以克敵制勝，名將如趙雲，也可以達到體察民瘼的「大臣（賢臣）」的高度。

回到武將在戰場上之表現，與「見識」相近的是「才識」。第 71 回趙雲以寡擊眾，親救黃忠，並以弓弩手埋伏壕中，大敗曹軍；因在漢中險峻地勢中施展韜略，被劉備讚為一身都是膽。贊評云：

成事只在膽，然才識亦自少不得也。但看趙子龍，一身都是膽，何嘗專以膽用事，其才其識俱有二十分也。吾補玄德之語曰：「子龍一身都是才，一身都是識。」（會評本，頁 883）

因此，大將之「才」，其實正是與「識」的配合，一位良將，要能有膽有識，像關羽被曹操目為「智勇雙全」，⁵⁷ 其在單刀赴會的表現，贊評以為

56 夏志清著，何欣、莊信正、林耀福譯，劉紹銘校訂，《中國古典小說》，頁 88。

57 第 74 回，曹操傳令龐德：「關某智勇雙全，切不可輕敵」；又於禁云：「魏王有戒：關公智勇雙全」。（以上見會評本，頁 654、656）然而，夏志清認為，相較於諸葛亮，曹操也屬於《三國》裡很少看透關羽的人物，為其不可一世的英名風所震懾，一上來就愛慕他的孔武有力，後來也從未改變。見氏著，何欣、莊信正、林耀福譯，劉紹

是「三十分識，三十分膽，三十分才」（會評本，第 66 回，頁 817），也具有大將的高度。不讓蜀漢武將專美於前，第 76 回徐晃分兵深入，神出鬼沒，拔盡蜀軍寨柵，並力挫關羽，解樊城之圍。曹操讚揚：「公明真膽識兼優者也！」（頁 672）從趙雲到徐晃，「膽識兼優」正是小說中文武雙全的最高理想：⁵⁸ 書生有才識，也要有膽氣；大將有膽氣，還要有才識——所謂「大將」與「戰將」的價值判斷，其實也就落在「才識」之高低。

此外，才識的取得，來自經驗與智慧，前者靠累積，後者可由薰陶而來。以老將黃忠為例，漢中之戰中連敗張郃、韓浩、夏侯淵等，計奪天蕩山、定軍山，不僅驍勇，而且善用驕兵、伏兵之策，謀勇兼備。毛評云：「孔明之兩用黃忠，非用其老也，用其老而壯也；又非專用其壯也，用其壯而老也。蓋有老謀而後有壯事。老而壯，則其老不為弱，壯而老，則其壯不為輕。」（會評本，第 71 回，頁 872）「老」雖然會侵蝕武士的氣力，但卻添了幾分判斷力，使之在戰場上的表現更為熟練（老謀深算）。其他如第 63 回嚴顏聞劉璋請劉備入川，判斷此為引虎自衛之舉，毛評稱其「可謂老識」（會評本，頁 782）；又如第 108 回「丁奉雪中奮短兵」，擊退來犯的魏兵，被毛評譽為「能謀，是老將之智」、「能戰，是老將之勇」；這位不起眼的東吳軍官，經過歲月的粹練，逐漸成為獨當一面的大將，贊評稱之「有見識」（以上見會評本，頁 1322-1323）。

至於薰陶而來，可見的是張飛的成長。王資鑫以「遞升式武打」形容小說家之寫張飛：最初不過是魯莽豪爽的粗人，後來在長坂橋的表現，慢慢粗中有細，智勇結合；而到了戰嚴顏及張郃時，不僅克制急躁情緒，理智而冷靜地對待戰局，而且展現出有政治成熟度的帥才（招降敵將及安撫百姓）。⁵⁹ 關於張飛的成長，評點者不約而同指向諸葛亮的影響。⁶⁰ 這位

銘校訂，《中國古典小說》，頁 87-88。

58 毛評云：「玄德讚子龍只是一身膽，今曹操讚徐晃又添一個『識』字。」（會評本，頁 933）。

59 王資鑫，〈論《三國演義》的長靠武打藝術〉，頁 24-25。其且認為，張飛的政治成熟度遠遠超過感情用事的關羽，在五虎將中排行第一。

60 漁評云：「老張從不肯用計，想亦從孔明後陶練出來」；毛評云：「未遇孔明之前，則

登場時不過一介屠戶的將領，透過觀摩而能舉一反三，由「戰將」蛻變為「大將」；由此可知，不只文人需要讀書，武士也需要學習，引文濟武，由武入文，才能琢玉成器——文武之道的融會貫通，在莽張飛身上展露無疑，真可謂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

四、馬蹄不如牛背：文武與治亂之辯證

所謂「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第 1 回，頁 1）的治亂循環，其實也與文武辯證糾纏在一起。活躍於《三國演義》中的名將，實在是時勢造英雄下的產物。如劉玲娜所言，關羽、張飛、廖化、周倉、典韋、許褚等一大批人在依屬各自的政治軍事集團之前，其身分皆可定位於江湖好漢，在天下一統、秩序井然的「正常」年代，這些既無出身背景又無經史學問的小人物很難在社會政治大舞臺上有所作為——動亂在給民眾帶來災難的同時給江湖好漢提供了機會，武力幫助他們從邊緣走向中心。⁶¹

相對而言，吳光正引用劉長卿的詩句：「時艱方用武，儒者任沉浮」，說明三國時代社會動盪下，文士們的「正常」仕途遭到破壞，只好把目光投向那些有志一統天下的諸侯的歷史背景。⁶² 這件事帶有兩面性，一來是傳統忠君理想的挫折，二來是擇主自由的解放；從前者來說，這是文人的不幸。眾所皆知，黃巾之亂是《三國演義》故事的起點，但鮮少人注意到書中用簡單筆墨帶到的黨錮之禍（嘉靖本隻字未提），但金文京提到，這場與外戚、宦官之間的鬥爭不無關係的政治打壓，催生了黃巾之亂。其推

勇有餘而智不足；既遇孔明之後，則勇有餘而智亦有餘。蓋一入孔明薰陶而莽氣化焉。驕氣亦化焉。勇不可學，而智可學。翼德之勇，固其素有，而其智，則孔明教之云」；贊評云：「張翼德早年鹵莽，後來卻大入細，此皆孔明薰蒸之身也，所以擇人而處，處世第一件緊要事也」（以上分別見會評本，第 41 回，頁 522；第 63 回，頁 775-776；第 70 回，頁 871）。

61 劉玲娜，〈尚力與尚義——《三國演義》死亡描寫的聚焦點〉，頁 24。

62 吳光正，〈《三國演義》中的文士心態初探〉，頁 53-54。筆者按：吳光正對於小說中「正統觀念與忠君事主觀念的困擾與擅變」有較為詳細的說明（見頁 55-57）。

測：許多對體制不滿的下層文人受黃老思想影響，加入太平道；加上黃巾賊的主力在穎川（這是當時文化程度最高、清流派知識份子最多的地方），這場叛亂是謀求體制內改革的穩健派文人，與企圖推翻體制的激進派文人的內部之爭。⁶³

巧妙的是，在小說中對於張角的出身，稱之為「不第秀才」，毛評批之「脫儒巾而裹黃巾，負卻秀才本色」（會評本，第 1 回，頁 3），暗示其棄文就武的身分轉變。⁶⁴ 一個落拓潦倒的文人，點燃了席捲中原的戰火，直到晉「武」帝統一天下為止，這是整體小說的首尾，不可忽略其中由文到武的轉折。第 9 回董卓被殺後，王允堅持治罪李傕、郭汜等人，賈詡勸之起兵殺入長安，毛評又說道：「只賈詡一言便使長安大亂，武士兵端起於說士舌端，可畏哉！」（會評本，頁 102-103）長安的動盪，正是整個天下的縮影；無論張角、王允或賈詡，這些文人自己把漢朝推向無邊無際的兵燹之中，也影響了無數英雄的命運。

以曹操來說，在第 48 回橫槊賦詩的場景，藉由文武全才的展示，證明了自己不管仕途或軍旅的哪一種選擇，都有充足的才華去攀登巔峰。李志宏說，許劭給予「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評價，為曹操形象做了一番定調，⁶⁵ 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曹操之步上「奸雄」之路途，則充滿了隨波逐流的偶然性。同樣是另一個宴會的場合，地點從長江移到了漳河之畔的銅雀臺，在這個曹操視為晚年安樂之處，其首先要求武官比

63 （日）金文京著，林美琪譯，《三國志的世界——東漢與三國時代》，頁 44-47。扼要來說，東漢時代的問題之一，在於官僚與外戚保持合作關係，而天子為了對抗這股勢力，求援於宦官，最後兩邊產生嚴重的衝突，波及了抨擊政權的知識份子。詳見氏著，林美琪譯，《三國志的世界：東漢與三國時代》，頁 34-44。另可見（澳）張磊夫著，方笑天譯，《國之梟雄：曹操傳》，頁 10-11。不過，張磊夫並未針對黨錮之禍與黃巾之亂的關係提出聯想，只說朝廷與士族的僵持，到了黃巾起義爆發才打住。

64 （日）金文京也注意到這點，並提到清朝的洪秀全同樣是落第書生，後受基督教教義啟蒙而發起太平天國之亂，二人都有書生的身分，但卻放棄仕途而轉而領導軍事行動，可見「棄文就武」的暗示。詳見氏著，林美琪譯，《三國志的世界——東漢與三國時代》，頁 47。

65 李志宏，《「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9）頁 281。

試騎射，然後又命令文士進佳章以紀勝事。就在文武簇擁的氛圍之下，曹操自陳平生：

孤本愚陋，始舉孝廉。後值天下大亂，築精舍於譙東五十里，欲春夏讀書，秋冬射獵，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不意朝廷徵孤為典軍校尉，遂更其意，專欲為國家討賊立功，圖死後得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平生願足矣。念自討董卓、剿黃巾以來，除袁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又復何望哉？（第 56 回，頁 489）⁶⁶

毛評提到其中所透露出的訊息：從「始舉孝廉」到「不意朝廷徵孤為典軍校尉」：「出身是文，出仕是武」；「春夏讀書，秋冬射獵」：「一句文，一句武」；「遂平天下，身為宰相」：「武功絕頂，文官極品」（會評本，頁 692）。可以看得出來，曹操的戎馬生涯其實頗出人意表，因戰禍而脫離了文臣仕進的正軌，但又以軍功（當然包含謀略）而攫取了文官高位。不過，這似乎又不讓人意外；當窳敗的陰影悄悄吞噬中州時，這位青年不只讀書，也投入射獵的訓練——看似無心插柳，實則有心栽花。正因曹操早已為了在治世做一名「能臣」而準備，所以才能獲得亂世之「奸雄」的資格。

另一方面，在曹操的告解中還透露出一個訊息：「孤常念孔子稱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頁 490）曹操首次提到周文王，並視之為效法的目標。另一個自比文王的場景是在第 78 回，曹操以為「苟天命在孤，孤為周文王矣」（頁 688），以終身不踰矩表現出對漢室最後的忠心，但巧妙地將鼎革之事留待後嗣，而後曹丕繼位，卻追諡其為「武王」。「文」或「武」的差異在於守成或開創，⁶⁷ 在小說中這個爭議性的名號與道德評價纏繞在一起，但若撇開歷史上的形象，曹操父子都試圖以「文」來為自己的歷史作為定錨，正是希望維持現有的秩序（在曹操是漢，在曹丕是魏），

66 這段話改自〈讓縣自明本志令〉，張磊夫曾分析這篇文章，有意思的是其也是在〈短歌行〉（小說中曹操橫槊賦詩之作品）後接著討論。見氏著，方笑天譯，《國之梟雄：曹操傳》，頁 300-308。這兩篇文章不只展現了曹操的文采，在小說家刻意安排創作時機下，也突顯其文武雙全的形象。

67 毛評以為「文」是「繼體守文」之意。見會評本，第 91 回，頁 1113。

無意大刀闊斧，徒增新的混亂——只不過，心與口之間的差異，已無可挽回二人的形象，中原板蕩的局勢也註定持續下去。

混亂的世道雖然為張飛、許褚、甘寧等武夫創造了封妻蔭子的機會，也讓曹操、諸葛亮、司馬懿這樣由文入武的人中龍鳳，獲得了大展身手的舞臺，但畢竟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結構，對於思索分合循環的小說家而言，也藉此提出辯證。第 28 回關羽作客關定莊，關定有子二人，哥哥關寧學文，弟弟關平學武，關平於是得到青睞，被關羽認為螟蛉子，並隨父東征西討，直到敗走麥城為止。關寧因此湮沒於小說的敘述之中，暗示了文人的式微；但關平風華正茂卻壯志未酬身先死，難道是更好的人生？同一回之中，關羽在郭常家借宿，郭常提到：「老夫耕讀傳家，只生此子，不務本業，惟以游獵為事。是家門不幸也！」關羽安慰：「方今亂世，若武藝精熟，亦可以取功名，何云不幸？」（頁 246）郭常之子之所以「不務正業」，固然肇因於其品行薄劣，但豈不也跟世道迤邐，耕讀無益的大環境有關？

潛藏於中的叩問，到了第 37 回崔州平與劉備一段有名的對話達到高峰。崔州平所代表的，正是「命運」（天）的順從；其以為治亂無常，現今干戈四起，正是由治入亂之時，要斡旋天地，只是徒勞。劉備所代表的，則是「意志」（人）的挑戰，自己身為帝胄，理應匡復漢室，不敢委之命數。（詳見頁 328）崔州平消極地與亂世保持距離，和劉備的積極投入，象徵了「文」與「武」對世道的見解——張飛聽完崔州平話語後，直斥為「腐儒」，恰恰是武將對文士的反駁。

當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選擇置身事外，豹隱林間，可是投入官宦的——例如華歆或魯肅，很明確地希望輔佐主公另建功業，若非人格卑劣，便是順從歷史洪流，其動機與「斡旋天地，補綴乾坤」的諸葛亮不可同日而語。夏志清提到，儘管《三國演義》中大多數重要角色都想揚名，但另有一批無關輕重的人物——法士、術士、相士、醫士和恃才傲物的狂士等——專愛嘲罵那些成名心切的豪傑。乍看之下，諸葛亮好像和于吉、禰衡之流不大相同，實則他和他的朋輩當初在南陽時，無形中是對群雄爭

霸局面的一種批判。⁶⁸ 正因為諸葛亮早已洞徹一切無可挽救，所以當其有感於三顧之恩而出仕的那一刻，便決定了「星落秋風五丈原」的結局。武鄉侯「知其不可而強為之」的精神，被毛評不無沉痛地指為「愚不可及」（會評本，第 97 回，頁 1182），對應的正是司馬徽、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等隱士若即若離的身影。但這當然不是一種責難，而是惋惜諸葛亮知事之必敗而仍為之。毛評在第 37 回也早已指出：「使三國名流盡學水鏡、州平、廣元、公威，而無志決身殲，不計利鈍之孔明，則誰傳扶漢之心於千古？」（會評本，頁 459）。

浦安迪認為，諸葛亮鬥爭到底的執著態度，既有陳腐的書生氣，也有浪漫的革命精神；⁶⁹ 在某種意義上，這象徵了文人而尚武的不屈不撓，是一種悲劇英雄的姿態。此間之成敗辯證是相對而論的，與崔州平等人的獨善其身相較，諸葛亮勇於承擔的胸懷自然崇高許多，可是倘若從實效來看，李志宏所關注到的劉備等人應募從軍，寄寓「英雄出世」並同心合力「平治天下」的救世思想，⁷⁰ 到了「六出祁山」、「九伐中原」而徒勞，卻不過證明武力的破產。到了末期，就連張翼、廖化等將領都慢慢傾向轉攻為守。⁷¹

甚至劉備本人，雖然曾發出髀肉之歎，以為荒廢武術，一事無成，但是在躍馬過檀溪，躲過蔡瑁追兵後，看到一牧童端坐牛背，對面吹笛而來，亦不免自愧弗如。毛評云：

前玄德以髀肉復生而悲，何其壯也！至南漳道中見牧童吹笛而來，乃有「吾不如也」之歎，頓使英雄氣盡。蓋馬蹄甚危，牛背甚穩；長鞭甚急，短笛甚閑。碌碌半生，征鞍勞苦，豈若散髮林間，行吟澤畔，為足逍遙而適志耶？非但玄德不如，即效死之龐統，盡瘁之孔明，皆

68 夏志清著，何欣、莊信正、林耀福譯，劉紹銘校訂，《中國古典小說》，頁 96-99。

69 (美) 浦安迪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頁 436。

70 李志宏，《「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頁 127。

71 第 110 回姜維三次北伐，張翼云：「蜀地淺狹，錢糧鮮薄，不宜遠征；不如據險守分，恤軍愛民：此乃保國之計也」、第 115 回姜維八次北伐，廖化云：「連年征伐，軍民不寧；兼魏有鄧艾，足智多謀，非等閒之輩；將軍強欲行難為之事，此化所以不敢專也。」（頁 981、1015）

不如也。水鏡先生寧老於南漳而不出，有以夫！（會評本，第 35 回，頁 436）

劉備看似義無反顧，卻也曾徬徨、動搖，顯示出亂世之中的武人看似前程錦繡，其實步步驚心，這正所謂「馬蹄甚危，長鞭甚急，征鞍勞苦」。就連大宴銅雀臺的曹操也不得不承認，自己雖然權傾天下，然而一旦解除兵權，必然遭人所害：從劉備到曹操，不管選擇皈依於正統與否、扶漢或代漢，其實都是騎虎難下，如坐針氈。相較之下，真正的智者：遁世逃名的隱士，或者擁有的是更富有的資產吧？至少這些人「牛背甚穩，短笛甚閑，行吟澤畔」，雖然「平」不了天下，但卻享有「寧」靜的人生。

所以，「馬蹄」與「牛背」與治亂關係之優劣，就這樣在評點家的目光中不斷擺蕩，毛評既肯定諸葛亮「傳扶漢之心於千古」，但又認為效死之龐統，盡瘁之孔明皆不如牛背上的牧童，這證實了以武濟世來維持廟堂正統，和選擇歸隱江湖、冷眼旁觀之間的兩難，讓人進退維谷。⁷² 不過，由亂返治還是小說家所欲寄託的。當讀者們醉心於《三國演義》龍爭虎鬥的場景，卻有一批文士試著規諫君主偃武興文，如第 66 回參軍傅幹上書勸曹操罷南征之議：

幹聞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相濟，而後王業成。往者天下大亂，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耳。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戰。愚以為：且宜增修文德，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待時而動。（頁 587）

曹操覽畢，開啓了興設學校，延禮文士的事業。第 98 回張昭也勸孫權不

72 同樣的矛盾，可見贊本第 37 回中，關羽問劉備聽完崔州平之言後的看法，劉備說自己雖知「無道則隱」的道理，但身為炎劉餘枝，豈能坐視？並云：「況有諸公竭力相輔，安能不治亂扶危」（會評本，頁 471），透露出希望倚仗兩位義弟的武藝，力挽狂瀾的期許。（美）浦安迪亦認為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場景：「裡面寫的是劉備本人在前去誘請諸葛亮出山來參與最後顯得是悲劇性世俗角逐的路上，一語道出了退隱的理想，並感歎那些被迫挑起歷史重擔者的重大犧牲；聽到關羽贊同這種心意後，他深表嘉許，說：『雲長知我心也。』」見氏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頁 465。不過，可能是因為此版本敏感地讓關羽以「屈原雖知懷王不明，猶捨力而諫，宗族之故也」為喻，貶損了漢主的賢明形象，因此被毛宗崗刪去。

可伐魏：「陛下初登寶位，未可動兵。只宜修文偃武，增設學校，以安民心」（頁 871）。傅幹和張昭的建議都獲得認可，且在此前後，曹操被拱稱王（因荀攸死而作罷），孫權踐位為帝，都是斗轉星移，人心浮動的時刻。兩位梟雄紛紛放棄耀武揚威的手段，興辦庠序，正是要彰顯「文德」，填補亂世百姓之所失，讓文人重拾對仕進的信心。⁷³ 上述情節的敘寫，側面反映出這部乍看以武士為敘事核心的小說，背後蘊藏著對太平盛世的想像與期許——所謂「平天下」的寄託，固然無法仰賴自居「文王」的曹操，⁷⁴ 但似乎也難以兌現在以「章武」⁷⁵ 為年號的先主身上，後者更暗示了明主不可得、匡扶漢室理想的難以為繼。

五、結 語

作為講史小說的代表，《三國演義》中的文武辯證實有許多值得關注的地方。本文從書中文武競爭的緊張關係出發，雙方意見分裂的著名場景，首推東吳陣營在赤壁戰前的和戰爭論，所謂「文官欲保身、武官不惜死」，側面道出「文人無行」的卑弱。評點家為了突顯「文人無行」的「雌伏」、「臣妾」，刻意與性別意識掛鉤：被指為「文弱」的荊州，長期為蔡夫人把持，在關鍵時刻一刀未拔地屈膝於北軍，獻出此投降策略的

73 儘管與小說家的立場相左，但是歷史上曹操對於名士的延攬和禮遇，並形成正統在魏的輿論壓力，詳見（澳）張磊夫著，方笑天譯，《國之梟雄——曹操傳》，頁 283-295；（日）金文京著，林美琪譯，《三國志的世界——東漢與三國時代》，頁 184-187。

74 李贄評尖銳地諷刺傅幹的意見：「此書所言，字字可用，惜操賊不足與語耳！」（會評本頁 820）。

75 （日）金文京曾注意到劉備稱帝以「章武」為年號的意義：章武的武取自光武帝的武，彰顯劉備想學光武帝，立志討伐如王莽般的篡奪者曹丕，復興漢室。見氏著，林美琪譯，《三國志的世界——東漢與三國時代》，頁 123。在小說中，崔州平也曾提到：「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竄逆，又由治入於亂；光武中興，重整基業，復由亂而入治」（第 37 回，頁 328）。可以理解劉備對自己「由亂而入治」的使命感，但「章武」同時也象徵著以武為先。後來此理念的承繼者，諸葛亮、姜維陸續失敗，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代表著窮兵黷武的命運。此外，第 112 回譙周作「讎國論」，規勸姜維勿從事「極武黷征」的北伐，並說當今之事，「可為文王，難為漢祖」，被姜維斥為「腐儒之論」。（頁 994-995）。

正是傅巽、蒯越、王粲等一批文士，這些人的膽怯，被形容為「不異婦人之見」。可是，文武之間的「剛柔」，不完全由職位決定，端看有無「丈夫氣」。例如陳宮與呂布雖說一文一武，但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前者慷慨赴難，被譽為「丈夫何壯哉」；後者表現出來的貪生畏蕙，則被目為「柔軟無丈夫氣」，由「剛」的質性墮落為「柔」的懦弱。

另一方面，貂蟬巧妙的身段被形容為「女將軍」，也為讀者帶來文武關係的思考。這位柔弱的佳人，輕易地制服了勇猛的呂布，對於關羽、張飛等剛強的武人來說不啻是種木強則折的反諷。《三國演義》中不只一次提到，作為統御三軍的將領，應該剛柔並濟，暗示了文道與武道實有融會貫通之處。小說家對於文武的寄託，分別是讀書人應能養「至大至剛」之正氣，在外交及戰場上，才能有充足的膽量，表現得沉穩、冷靜，帶領我方化險為夷——最具代表性的典範，正是「書生而有將之才」的陸遜。此外，「大將」與「戰將」之差異，就在於有無見識、才識，而非有勇無謀，趙雲、姜維、張遼、徐晃、鄧艾等人，顯然是膽識兼優的代表（這也象徵了小說中文武全才的最高境界），趙雲尤其以其仁人愛物，大處著眼的懷抱與格局，不只一次被毛評譽為有見識之「大臣」，不能單純以武將目之，泯滅了文武界線之限制，象徵了亂世之中賢臣的典範。至於黃忠的老謀深算、張飛的舉一反三，亦暗示了大將之才是有可能透過經驗及薰陶而來的。

最後，雖然一般看來《三國演義》是一部謳歌武士的作品，書中留給讀者深刻印象的，也多是來往的戰爭場景，但追根究底，天下大亂的淵源在於黨錮之禍，以及「不第秀才」張角的棄文就武。儘管兵連禍結的時代，是張飛、許褚、甘寧等出身低劣的武人的大好機會；具備「治世之能臣」資質的曹操，也如魚得水地蛻變為「亂世之奸雄」，但從其以周文王自詡的意圖來看，可以看得出來魏王仍無意顛覆帝國秩序，只願「繼體守文」。紊亂的局勢，使得崔州平的消極避世，以及劉備的積極入世成為難以交集的對比；從故事的發展來看，後者所代表的「章武」精神終究節節敗退（馬蹄不如牛背）——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的徒勞無功，成

為小說中引人省思的一筆。綜合來說，雖然「文王」或「章武」的自我定位，多少都有點模稜兩可的嫌疑，但至少偃武修文，由亂返治，應該是普天下有志之士彈冠相慶的終極理想。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羅貫中，《三國演義》，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4。
陳曦鐘、宋祥瑞、魯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二、近人論著

- 于洪江 1993 〈試論《三國演義》對曹操異姓將領的塑造〉，《佳木斯教育學院學報》1993.1(1993.3): 40-44。
王資鑫 1987 〈論《三國演義》的長靠武打藝術〉，《揚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4(1987.12): 19-27。
王前程 2007 〈《三國演義》與古代將相文化〉，《中華文化論壇》2007.1(2007.3): 71-75。
伍大福 2016 〈論《三國演義》與士文化〉，《湖北文理學院學報》37.9(2016.9): 5-10。
曲明鑫 2007 〈淺談毛宗崗對《三國演義》中女性形象的評批〉，《瓊州學院學報》14.3(2007.6): 68-69。
李勝 2014 《四大奇書中的女性形象探析》，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李志宏 2019 《「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巫夢曉、許中榮 2019 〈《三國演義》中隱士書寫的文化解讀〉，《湖北文理學院學報》40.10(2019.10): 5-10。
吳光正 1994 〈《三國演義》中的文士心態初探〉，《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2(1994.6): 52-57。
（日）金文京著，邱嶺、吳芳玲譯，李均洋校 2017 《《三國演義》的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
（日）金文京著，林美琪譯 2019 《三國志的世界——東漢與三國時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夏志清著，何欣、莊信正、林耀福譯，劉紹銘校訂 2016 《中國古典小說》，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
- (美) 浦安迪 (Andrew H. Plaks) 著，沈亨壽譯 2015 《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北京：三聯書店。
- (美) 浦安迪 (Andrew H. Plaks) 2019 《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陳 遼 1995 〈《三國演義》中的謀士形象〉，《南通師專學報 (社會科學版)》11.1(1995.3): 1-5。
- 陳抱成 1999 〈《三國演義》裡的「說客」與「辯士」〉，《鄭州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32.6(1999.11): 111-116。
- 陳佩姝 2017 「《三國演義》中吳國武將之形塑研究」，桃園：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康正果 2016 《重審風月鑑——性與中國古典文學》，臺北：釀出版。
- 張蕊青 1996 〈《三國演義》中文人形象掃描〉，《江蘇社會科學》1996.1(1996.2): 124-126。
- (澳) 張磊夫 (Rafe de Crespigny) 著，方笑天譯 2019 《國之梟雄——曹操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馮文樓 2003 《四大奇書的文本文化學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葉松林 1998 〈謀士與皇權——《三國演義》中謀士形象評析〉，《荊門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2(1998.6): 35-39。
- 廖瓊媛 2003 《三國演義的美學世界》，臺北：里仁書局。
- 劉玲娜 2008 〈尚力與尚義——《三國演義》死亡描寫的聚焦點〉，《西華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2(2008.4): 21-25。
- 劉文菁 2010 「《三國演義》五虎將人物形象研究」，宜蘭：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
- 魯德才、陳洪 1988 〈《三國演義》中的軍事心理學〉，《海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1988.3(1988.9): 13-19。
- 羅曉芳、雷勇 2017 〈《三國演義》中的說客及其游說藝術〉，《陝西理工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35.2(2017.5): 52-57。

The Bravery of Scholars and Insight of General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Metaphor for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seng Shih-hao*

Abstract

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amount of outstanding talent is seemingly innumerable, including scholars such as Zhuge Liang 諸葛亮, Guo Jia 郭嘉, Zhou Yu 周瑜, and Sima Yi 司馬懿 as well as generals such as Guan Yu 關羽, Zhang Liao 張遼, Gan Ning 甘寧, and Lu Bu 呂布, both parties of which have been admired for their proficiency in *wen* 文 (civil) *wu* 武 (military or martial) affairs, respectively. Owing to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contentions within and between the two camps are inevitable, and gender is often used by the novelists to imply the rigidity and weaknesses of as well a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officials. However, *wen* and *wu* are not in absolute opposition and the two ought to cooperate in an effort to defeat one's enemies. In one regard, scholars need to exhibit courage to remain calm under adversity and in times of conflict; and in another, generals must possess wisdom to perform well in both diplomacy and war. In this way, bravery and insight are complementary and neither are indispensable. Moreover, the civil-military relationship discussed within the novel also illustrates a hint of metaphor; that is, by comparing and criticizing the masculine "hard" 剛 and feminine "soft" 柔 characteristics of officials, the novelists associate notions, such as *wen* and *wu* or bravery and insight, with the effects of peace or war on politics. Therefore, by analyzing these metaphors with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we can better grasp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 Tseng Shih-hao,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Keyword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ivil and military, masculinity, bravery and insight, chaos and governance

